

纪念五四运动 六十周年论文集

2751083

十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

说 明

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校一些同志写出一批论文，参加了校内外学术讨论会。现将一部分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论文汇集成册，以供研究参考。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

1979年9月

目 录

总结历史经验 面对新的课题.....	哲学系	李秀林 (1)
——关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 相结合的几个问题		
从五四运动看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中共党史系	彭 明 (20)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	中共党史系	彭 明 (34)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封建思想.....	清史研究所	林铁钧 (48)
“五四”运动时期争取民主与法权的斗争	法律系	张晋藩 曹宪义 (67)
发扬五四精神促进汉字的根本改革	语言文字研究所	王宗伯 傅兴岭 宋柏尧 (85)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中共党史系	戴鹿鸣 (96)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	中共党史系	尚效钦 (132)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		
五四前后的周恩来.....	中共党史系	胡 华 王建初 (151)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	中共党史系	胡 华 彭 明 (162)

总结历史经验 面对新的课题

——关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几个问题

哲学系 李秀林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开端。六十年来，我们事业发展的历史，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和胜利的历史。六十年来，多灾多难、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享受过胜利前进的欢乐，也备尝了遭受挫折的苦痛。痛定思痛，我们千万要牢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的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这个可靠的指针，吸取历史的教训，用来解决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一崭新的课题。

一、可靠的指针

只有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

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使我们国家繁荣富强，使我们民族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漫漫长夜里，先进的中国人，暗中苦斗，历尽艰辛，寻求富国强兵、振兴民族之良策。年轻的毛泽东同志就曾抒发过这样的抱负：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

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改换全国之思想，为此大翻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可是，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这个历史的课题，要求人们作出正确的回答。

十月革命的炮声迸发出新世纪黎明的曙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马列主义一经传到中国，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耳目为之一新，如同久旱之逢甘霖。在此以前，人们在探讨：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今以后，这样的探讨，就其实质来说，变成中国要不要和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争论。因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国内外条件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出路只有一条：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科学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今天，在我们直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仍然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从这里可以找到充分的历史根据。

马列主义需要中国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4页）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初是从外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它是普遍真理，同时又带有德国以及英、法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列宁主义产生于俄国，它是普遍真理，同时又带有俄国的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就其具体实现来说，又不能不带有各个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色

形。要使马列主义理论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就必须使它中国化。不如此，仍然不能够救中国。普遍真理只有同具体实践相联系才能得到实现，具体实践只有在普遍真理指导下才能胜利发展。二者的结合，既是由马列主义理论的本质所规定，又是为具体的革命实践所要求。

从事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既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又是同我们伟大民族的历史、传统、利益和特性，同她的前途和命运血肉般地联系着。因此，“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8页），就成为自己的天职。这一“理论性的创造”的伟大成果，就是作为我们党的集体财富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前资本主义关系相当浓厚的特殊国情，揭示了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的年代里，又提出了关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所有这些，无一不闪耀马列主义的光辉，无一不具有中国革命的特点，都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成功结合。

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结合，不仅贯穿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上，而且体现在哲学的理论上。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两篇著名的代表作。“两论”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就是从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作了深刻的、系统的概括和论证，并围绕这一中心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论》围绕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论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揭示

了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得出必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思想路线的结论。《矛盾论》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着重阐发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一定要遵循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运动的秩序。从认识论来看，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属于主观、理论的方面；中国的实际国情属于客观、实践的方面。从辩证法来看，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属于共性的方面；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属于个性的方面。《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从认识和实践、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上，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作了深刻的论证和高度的概括。“两论”科学地说明了，为什么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了就是正确的，正确的理由是什么；分裂了就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哪里。这样，就为这一最重要的原则，提供了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毛泽东同志说过，搞哲学要注意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6页）。所谓中国革命的逻辑，就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或者说，是革命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特殊表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紧密地联系着、科学地概括了中国革命的逻辑。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所以能够牢固地树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同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深入人心有着密切关系的。

正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一九四九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接着在一九五六年又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从而为直接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创设了社会条件，开辟了广阔前景。历史的结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传家宝，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的指南针，是从五四以来中国人民一切斗争经验中最可宝贵的历史经验。

曲折的胜利之路

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道路。六十年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航船，是从曲曲折折的航道中行驶过来的。

前三十年，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党的成立、北伐战争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从八一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向井冈山进军、开展土地革命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最后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期间，小的曲折和反复不计其数，几乎断送了革命的大的挫折就经历了两次，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走了一个“之”字形。

后三十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不是径情直遂的。就国民经济的情况来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曾经有过高速度的、持续的发展；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经过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又得到复苏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遭到空前的浩劫，濒临总崩溃的边沿；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重新走上巩固发展的道路。人们把这种上——下——上——下——上的发展曲线，叫做两个“马鞍形”。与此相联系，我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也有大体类似的情况。

半个多世纪走过的道路，是一部无比丰富、生动而实际的历史教科书。它给我们的最大教益是，当着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指导下进行时，就会得到胜利和发展；当着革命和建设事业偏离以至违背了这一思想原则时，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挫折和失败。这条历史的真理，早已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全党同志所确认，并在尔后的实践中获得了进一步的证实。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特别

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由于林彪、“四人帮”这类野心家的作祟，我们党的这条一贯的思想原则却遭到了愈来愈严重的破坏。林彪和“四人帮”在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破坏革命实践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历史的教训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9页）能够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一些的历史教训是很多的，这里，兹就如何对待理论和对待实际两个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切忌把理论引向“绝对”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4页）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是王明等人的虚伪和骄傲的态度，一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诚实和谦逊的态度。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朴素无华的毛泽东思想蔑称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把自己那套夸夸其谈的“本本主义”捧之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山沟里”的即土生土长、同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比起那个自封的“百分之百”要强胜百倍。王明教条主义者夸下海口，以为自己掌握了包医百病的灵药，结果把革命引入绝境，正是被诬之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指导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同志经常用我们党在历史上由于骄傲而吃了大亏的事实告诫全党。他在建国前夕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

东西有些快要闹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7、1369—1370页）从这些指示中可以体会到，“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诚然是很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但仍然有着自己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我们既要继承“山沟里”的优良传统，又不能老是停留在“山沟里”的水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言教身传和事实的教育下，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保持了一付清醒的头脑，恭恭敬敬、老实地重新学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地埋头苦干，带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从而也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继续推向前进。

可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告诫，关于保持科学上诚实和谦逊态度的教导，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但是，正象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具有二重性一样，理论上的胜利也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提高了理论的威信，为理论的普及和提高、运用和发展，创设了有利的条件；另方面也包含着滋长骄傲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一个人工作上取得成绩，往往容易骄傲。同样，一种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它获得很大胜利的时候，如果不能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会“骄傲”起来，甚至会“扩大、膨胀”为脱离客观实际的“神化了的绝对”（《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主观本来是依赖于客观的，理论本来是依赖于实践的。但是，主观、理论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这就包含着一种使理论走向“绝对”，即脱离实践、自我膨胀的趋势。而当着理论得到胜利地实现，特别是当着无产阶级处于掌权的地位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理论的权威和政权的权威结合起来的时候，上述的趋势就有可能得到增强。如不加以警惕，理论就会变得傲慢无礼，失却对实践应有的谦恭，似乎理论本身的作用已变得“无所不能”，而对客观事实、群众实践却可以“满不在

乎”。斯大林在一九五二年说过，许多年轻的新干部，由于“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讶，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就认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它能消灭科学法则，能制定新的法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8页）。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不也是存在的吗？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无论在当时的苏联和后来的中国，这种情况决不只是发生在青年人中间。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同志中，存在着一种脱离唯物论来强调辩证法，脱离客观决定主观、实践决定理论来强调思想理论的能动性的倾向，可以说这是对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一种动摇和偏离。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他们的那个“理论家”，正是别有用心地利用了这一点，大售其奸，把思想理论的作用夸大为“绝对”，炮制了诸如精神的力量可以“超过”、甚至“代替”物质的力量，“人的思维可以决定物质”，思想理论是“最高最后的标准”等等一整套“倒过来”的唯心哲学。列宁说：“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不能运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事实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因为受到公开敌人的攻击而有丝毫的动摇，相反却在敌人的咒骂声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而象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打着“维护”、“捍卫”、“高举”、“紧跟”的招牌，故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得过火，抬到吓人的高度，却大大损害了它的声誉。以此为戒，我们在强调革命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寸，要尽可能避免用大话代替说理，用“无论怎样估价也不会

过高”之类的虚夸之词代替实事求是的分析。

人们会问，列宁不是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万能”的吗？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列宁的原话：“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这段话无疑是对的。它向人们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万能，取决于三个前提：①它是正确的，是来自实践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②它是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和世界观，而不是可以任意分割的支言片语；③它是同任何迷信和反动说教根本对立的。受着这几重限制的“万能”，只能从相对的、特定的意义上去理解，显然这同林彪、“四人帮”用摘引支言片语、加以夸大而炮制的“精神万能”、思想“决定一切”的现代迷信，不仅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恰是正相反对的。顺便提及，“万能”（Всесильно）一词，译作“力量无穷”，可能更贴切些；这样也更有利于堵塞把理论引向“绝对”之漏洞。

理论上的骄傲和绝对化所引起的不良后果是，既妨害了实践，压抑了广大群众生气勃勃的革命主动性和创造性；又妨害了理论本身，“使活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死教条的牺牲品”（《列宁选集》第8卷第26页）。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许多方面的严重落后状况，不能说同理论上的自我满足没有联系。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就一定要象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要“吃透”中国的国情

正值中国发生五四运动的一九一九年，列宁对俄国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

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列宁提出的这项任务看作是我们党的任务。这项任务，我们是否已经完成了呢？从我们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来看，应当说是出色地完成了；但是，“欧洲各国所没有的”“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在我国仍然没有完全消除，从这个意义说，列宁所提出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彻底完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造成经济上落后，政治上黑暗，文化上愚昧的状况。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社会能够以其特有的逻辑，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跃过了资本主义的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时期，这的确是人类社会史和世界革命史上的一个奇迹。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免除了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摆脱了剥削和掠夺以及其他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人间罪恶，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但同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积极成果，我们也没有来得及批判地吸取，这又不能不带来一系列由于“跳级”而产生的“补课”任务。对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关系，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秩序，是由资本主义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去扫除的（当然不可能是很彻底的）。在中国，历史的命运却作了这样特殊的“安排”：对于上述关系，需要我们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个时期内，努力地去解决。因此，列宁六十年前发出的伟大号召，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旧社会留给我们的烂摊子，经过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赋予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以青春的活力。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经济落后，文化科学水平低下，民主传统缺乏，小生产习惯势力以至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等等，仍然是压在新制度身上的“因袭重担”。这些现象象一条条有形或无形的绳索，纠缠着我们

前进的脚步，使人们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看到它们的影子，深感它们的存在。当然，这些历史遗留物的存在，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过错，不能由劳动人民负责，账要记在反动统治者的名下，林彪、“四人帮”这伙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旧事物的歌颂者和维护者也难逃其罪责。然而它们的存在，毕竟是个严酷的既成事实，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短处”。只看到“短处”，看不到“长处”，一味地怨天尤人，悲观泄气，无所作为，那是十分有害的；同样，只看到“长处”，看不到“短处”，对落后现象安之若素，采取不承认主义，甚至有意无意地把“短处”当作“长处”来炫耀，那也不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应取的态度。这两种片面的认识，都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多年来，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同上述两种片面性是有很大关系的，特别是第二种片面性和由此而来的盲目性，使我们吃了更大的苦头。以此为戒，在我们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一定要力求“吃透”中国的国情。

“吃透”国情，是为了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固有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战争问题时说：“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5页）大家知道，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成功的，因而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对于我们所进行的“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研究四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要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四个现代化的规律，更要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譬如，我国的底子薄、人口多这两个重要特点，就是必须看到的。为此，我们就要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崭新的课题。

三、崭新的课题

我们党在理论战线上的一贯传统是，“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0页）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革命的最大实际问题和中心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应当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 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个新课题，如同党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一样，包括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牢固地坚持它的基本理论阵地；一是深入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解决实际问题。这二者，不能分割，不可偏废。

首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四个现代化。在我们社会里，还存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坏分子，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因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这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ABC，真正拥护这些原则，就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否则就会走向反面，一切都要落空。社会主义道路，无

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四项原则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统一不可分的；去掉任何一项，就会全盘否定其他各项，就会葬送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起码要求，就是要全面地、不动摇地坚持这四项原则，同反对这四项原则、或者表面上只反对其中某一项原则的任何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

同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必须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领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力量。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否具有优越性以及优越性之大小，是看它们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促进的程度如何。它们归根到底要由自己带来的物质成果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显示自己的合理，争得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历史理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海市蜃楼式的空洞说教，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存在。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宣传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有充分的说服力。事实胜于雄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那么，我们究竟“做”得如何呢？建国三十年来，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得到过的进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的进步之快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少有的。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经济发展也是相当快的。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要快。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对未来的希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才得到了我国人民绝大多数的拥护和信赖。但是，不容讳言，由于种种原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远未得到应有的发挥。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的欺骗宣传和反革命实践，粗暴地践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林彪、“四人帮”打着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旗号，鼓吹和实行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以帮代党”的黑暗统治和禁锢思想的现代迷信，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统统给搞乱了。致使搞了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它究竟灵不灵，居然在一部分人中间（极少数敌对分子不包括在内）成为问题。足见林彪、“四人帮”那套同四个现代化相敌对的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的流毒之深和危害之烈。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说明，能不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威信和历史命运。能够对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和解决，就是对马列主义的真正坚持，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不然的话，说是坚持，说是高举，也是空的，甚至是假的。

总之，四个现代化需要四个原则，四个原则更需要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排除两种干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明确提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作为我们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这一英明决策，顺乎历史之潮流，合乎群众之需要，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干扰和阻力，这虽然属于支流的方面，但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现在有极少数人，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甚至叫嚷“国民